

割草少年

侯美玲

那年夏天,我总是一个人去割草。山坡上到处是绿意盎然的青草,野苜蓿、蒲公英、碱茅草、高丹草,少年的我孑然一身走在草丛中,不断挥舞着镰刀,四周青草纷纷倒下,空中漂浮着蒿草独有的气味。割满一筐草,我并不着急回家,而是坐在高高山坡上孤独地遥望远方,看云起云落,听晨钟暮鼓。那段时期,少年的我心中满是惆怅,却不知道如何向别人诉说。

一天下午,我和往常一样拿起镰刀准备去割草,父亲说他和我去。父亲每天忙着上班,为一家人的吃饭穿衣奔波劳累,像割草这种小事平常都是孩子们来完成,可那天他坚持要去,我只好默默跟在他身后。一路上,父亲欲言又止,我心事重重又懒得说话,我们一前一后走在山路上,始终不曾说一句话,像陌生人,却又是父女。

到了山坡上,父亲开始干活,他半弯着腰,一只手揽着蒿草顶端,一只手紧握镰刀,镰刀划出一道道弧线,发出“嚓嚓”的响声,青草应声倒地,成片成片铺在地上,我紧跟在父亲身后,快速将倒下的青草拾起来。直到两个竹筐装满青草,父亲才停下光亮的镰刀,坐在地上休息,示意我也坐下来。我们坐在山坡上,父亲若有所思,我则满腹心事。

山坡下是一条柏油马路,马路的尽头是中学,几个月前我刚刚离开那里。远远望去,学校宁静庄严,一排排教室蔚为壮观,操场四周绿树成荫。几个月没去,学校变漂亮了,那里的一草一木都让人充满怀念。那天是开学第一天,马路上出现三三两两上晚自习的学生,个个意气风发,女孩额头光亮,头发一律梳成马尾扎在脑后,走路时左右摇晃,显得活泼可爱。男孩朝气蓬勃,松软的短发在风中飞舞,浑身洋溢着快乐的气息。

男孩女孩全都背着干干净净的书包,沉甸甸的有点重,不用猜,里面一定装满了新书,有的同学怀里还抱着几本新书。隔着半个山坡,我仿佛能闻到书本散发的新鲜油墨味,一种让人迷恋的气味。我目不转睛盯着他们的身影,脑海里全是自己上学时的点点滴滴。是的,我曾和他们一样,抱着新书走向校园,在那里度过许许多多无忧无虑的日子。回忆过往,我感到由衷的快乐,想想未来,我陷入一阵阵迷惘。

父亲好像看出了我的心事,转过身来问:“你还想读书?”其实,年少的我并没有明确答案,那个年代的乡下,大多数孩子只读到初中毕业,接下来就要走向工厂和田间,开启成人生活。我在校期间成绩平平,没有考学希望,和我情况一样的同学都离开了校园。可不知为什么,我的内心深处又很留恋校园,感觉自己并没有做好走向社会的准备,所以我懵懵懂懂“嗯”了一声。

父亲又试探着问:“那我明天去找老师,给你报复读班,再上一年初三看看有没有进步。”父亲的话如同一道光,打开了我混沌的世界,我仿佛看到了一线希望,又仿佛抓住了命运的绳索。那一瞬间,我的世界一片光明,曾经暗淡的日子一去不返,那一刻,我感激地望着父亲,生怕他改变主意。

父亲忽然站起身,对我朗声说:“那就不割草了,回家收拾书包,明天去上学。”我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,爽快地答应了一句:“好嘞!”我们收起镰刀,背上装满青草的竹筐,迈着轻快的步伐走下山坡。

夕阳西坠,晚霞渐渐回归了洁白,如同天使翩翩起舞的翅膀。一路上,我不断想象自己重新坐在教室里的情景,朗读、听讲、做题、思考,少年的我暗暗下定决心,一定要发奋读书,以只争朝夕的努力,不负韶华的奋斗,为自己赢得最美好的明天。

雨中情
石颖 摄

螺丝岭上祭忠魂

朱康宁

张淑华家在潜山官庄镇螺丝岭,螺丝岭盘旋而上,岭上视野开阔,桐潜交界处的千山万壑一览无余。张淑华原是桐城童家铺人,在家排行老小,有“小霸”之绰号。她早年丧父,认戴长春为义父,早早跟着义父参加革命。

戴长春在当地颇有名气。1937年,红28军高敬亭部来到桐城花果园建立党组织。戴长春和妻子邵先启以开饭店为名接待来往的生意人,实际是桐怀潜中心县委的一个地下交通站。戴长春于1936年由宋海珊介绍入党,因他头脑灵活,机敏,人送外号“猴子”。15岁的张淑华提着竹篮在花园上、龙河边挖野菜,暗中瞭望放哨,防止敌人突然袭击;她背着竹筐到童家铺购买日用品,探得敌情告诉义父,俨然一个小侦察员。

戴长春交通总站建立后,负责收集、传递情报,掩护中心县委在饭店召开会议,接待往来的地下工作者,护送前往根据地的党员、干部和抗日青年,据统计,从这儿先后转往皖东和无为抗日根据地的人员达2000多人。

1938年,日军进犯安庆,桐城沦陷。国民党176师某部进驻皖西“清剿”游击队,桐城、潜山处在白色恐怖和腥风血雨中,戴长春有一种不好预感。一天夜里,他交给张淑华几块银圆,说:“孩子,你化装成讨饭的,不要暴露身份。今夜就往潜山后冲方向逃命,遇到好人家住下来,帮人家干点什么活儿。”张淑华理解义父的心愿,点点头答应了。

1940年3月,省直属第二十二工作团由怀宁经桐城转组织关系回立煌(今金寨),县委书记林立在戴长春饭店与该团团长见面,指示留下全部枪支,团长认为枪支系省政府配发,全部留下不好交代。林立决定由新四军游击队用“缴枪”的办法来解决,团长勉强答应。

次日,当林立、何杰之、桂平等人来到童家铺保公所(保长系地下党员)时,发现戴长春饭店已被敌人便衣包围。危急关头,林立为保护其他同志,自己只身进入饭店,想趁敌人尚未掌握自己身份之前与敌人周旋。此时邵先启灵机一动,沉着地走进保公所,通知何杰之等人从后门快速撤离,旋即又回到饭店,故意岔开便衣特务的纠缠,让林立趁机离开了饭店。后来敌人发觉上当了,恼羞成怒,将邵先启毒打一顿,然后将饭店东西砸个精光,戴长春的地下交通站就这样被敌人破坏了。1940年底,由于叛徒出卖,戴长春不幸被捕,1941年4月在桐城英勇就义。

张淑华逃到后冲后,开始帮工糊口,后来认识了杨庄的方雅周。方雅周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,从小帮人看牛、打工。1938年参加革命,为新四军收集情报,成为一名地下工作者。他介绍张淑华入党,最终成为一对革命伴侣。

张淑华得知义父被敌人杀害的噩耗,几天不吃,然后伤心得像个泪人。在她的心里,义父是

个顶天立地的英雄。张淑华化装成讨饭的来到童铺,久久站在义父坟前默哀,她告诉义父的在天之灵:一定要继承义父遗愿,完成革命工作。

1942年秋,杨震带领的新四军挺进团三大队某排在潜山后冲一带活动,张淑华为部队筹集柴米油盐等物资,布置可靠人员站岗放哨。

张淑华经常随新四军游击队转战于深山老林,练得一身好本领,夜行百里,双手使枪。一次战斗中,她举起双枪撂倒好几个“白狗子”,战士们称她“双枪嫂子”。她每年都得养三四十只鸡,鸡蛋就用来换油盐和改善伤病员伙食。每当伤愈战士离开她家时,她都要宰一只鸡,让战士喝上一碗老鸡汤。有的战士只端到嘴边闻闻,然后放下碗说:“嫂子,真的喝不下……”她一本正经地说:“这是命令,喝完!”战士离开时都握着她的双手说:“嫂子,请多保重。”她挥挥手微微一笑。

1943年冬,潜山伪政府“剿匪”指挥部派出武装力量进驻官庄山区,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地下工作者。敌强我弱,杨震部队只得紧急调防,组织上决定张淑华随部队转移。

此前,由于桂骥子被敌人捉去,经受不住严刑拷打,供出张淑华、方雅周夫妇“通共”的事。当张淑华收拾行李时,“白狗子”包围了她的家,她被逮捕。接着,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,坐老虎凳,灌辣椒水,受残酷迫害达两月之久。

她全身血污,伤痕累累。敌人逼她指认地下党成员,她愤然拒绝,说:“这一块只有我是共产党员,没有别人,要杀就杀,共产党员是不怕死的!”

敌人无计可施,便将她押到黄柏河活埋,土至胸口,敌人又用水灌,用刺刀乱戳。她用尽全身力气,高呼:“共产党万岁!”“打倒国民党反动派!”

张淑华英勇就义时,年仅22岁。夜雾笼罩的螺丝岭,千山万壑传来一声声凄婉的呼唤:“嫂子,嫂子……”

1940年,方雅周任中共后冲支部书记,负责新四军游击队后勤、侦察和联络工作。1942年,方雅周身份暴露,为安全起见,领导便安排他到游击队当指导员、大队长。他多次带领游击队袭击民团、乡公所,搅得敌人不得安宁。他深得新四军领导的赏识,战士们都亲切地喊他“大哥”。

张淑华牺牲后,方雅周失去了好伴侣、好搭档,心灵上的创伤无法弥合,但他强忍悲痛,坚持斗争,决心实现妻子张淑华的遗愿。

1944年,桐怀潜工委命令方雅周带领新四军一个排到桐城花山领取军鞋,不料中了国民党一个保安团的埋伏,双方发生激战,方雅周命令战友们快速撤进树林,自己留下断后。他拼命阻击敌人,身中数弹,最后壮烈牺牲。

夜雾笼罩的螺丝岭,又一次沉浸在悲痛之中,乡亲们正在安葬方雅周的遗体,远近传来战友们声声呼唤:“大哥,一路走好……”这悲怆的声音,犹如沉沉闷雷,回荡在螺丝岭的山谷中……

